

政治与社会译丛



分割与分层

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王丰 著
马磊 译

由于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分割，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类型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大幅加宽。虽然从当时的国际标准看，中国基尼系数仍然很低，但从城乡不平等方面来说，上述巨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使中国成为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收入差距仅仅反映了中国城乡不平等的一部分状况。实际上，中国城乡居民之间至少被 14 种制度安排所分割。居民之间基本上是通过能够获取农业或非农业身份的户来区分的。这一区分的基本体现是城乡居民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差别：粮食供应、副食品和燃料供给、住房、结婚和生育。总之，城乡居民分别面对着基于他们身份而来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机遇。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分别也因此远远超过了地理和统计意义上的分界，割裂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

分割与分层

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王丰 著

Wang Feng

马磊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 -
SOCIALIST URBAN CHINA, by Feng Wa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 / 王丰著;马磊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

(政治与社会译丛,第3辑)

书名原文: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ISBN 978-7-213-05246-0

I. ①分… II. ①王… ②马… III. ①城市-国民收入分配-研究-中
国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690 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2-152 号

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

作 者:王 丰 著 马 磊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电脑制版: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2 万

插 页:2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5246-0

定 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三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红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丛第三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

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

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译版作者序

1985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分割与分层》一书主要是对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本书除了记录这个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之外,更重要的是试图理解驱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快速加深的结构性原因。书中也对形成中国不平等格局的结构性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对结构性因素的研究与国际比较,是想通过对中国这个历史特例的分析,对不平等研究做出学术性的理论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不平等变化的历史表明,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程度快速加深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分类和集团组织。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产基础上,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深层的文化基础环境中产生的。在20世纪末中国经济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一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分割社会的边界被推倒。但与此同时,各种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也加剧了另外一些壁垒的作用,或导致了新壁垒的产生。中国社会改革前期的社会不平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作用的研究解释了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深层原因,也批判了研究不平等的文献中过分简单化的超个人主义(super-individualism)理论倾向和方法。

一部原本研究历史变化的著作,现在看来似乎成了对未来的预测。这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截至2000年,英文版的书稿是2006年完成的。十几年过去之后,不仅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趋势没有被逆转,而且收入的不平等已延伸至差距悬殊的财富分布。同时,书中分析的一些影响中国社会不平等的

过渡性的制度特征，也更加明显且日趋固化了。造成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加深的制度因素，如行业、地域、尤其是所有制不同的工作组织，在本书封笔之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增无减。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也使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中的势力急剧扩张。2011年与2000年相比，不考虑物价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75倍，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7.75倍。2011年，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已超过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前列。而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组织绝大多数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政府经济力量的膨胀，反而使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失去了动力，同时还助长了垄断行业与企业的兴盛与发展。政府在通过再分配降低不平等的同时，也由于容忍甚至扶植垄断行业 and 企业的壮大以及行政性寻租，造成不平等程度加剧、加深。这使得调整收入分配更加难以起步，因为国家既是降低不平等的希望，同时也成为造成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攀升与深化，使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以及两亿多的城市流动人口，并没有让隔裂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同样，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张，也没有缩小国有和民营企业之间收入的差距。2011年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职工比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高四倍之多。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增无减。随着财富的急剧增加，收入分层已经开始向财富分层转化。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已经开始体现在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上。改革后第一代收入与财富的积累，也已经开始向第二代人传递。如果说第一代之间的经济差别主要是受机会与能力影响，那么他们后人的生活机会差别则在更大程度上由家庭背景决定。这不仅是一个更分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更僵化的中国。

一个高度分化同时缺乏流动性的社会，也会是一个丧失经济活力和政治不稳定的社会。传统观念认为的公平与效率的互补关系，在这里成为一个伪命题。这是因为过度的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反而是低效率的经济。收入分配过度不均，不仅使处于中低阶层的众多社会成员无法成为促动经济成

长的消费力量,也严重影响这部分社会成员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基本投入,从而限制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同时认为这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公造成的,这些人就会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任。一个缺乏公共信任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从分割和分层走向一个流动和平等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目标,也是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社会经济的重新分化,但分化的社会隔离还在进一步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打破社会隔离障碍,重注社会流动性,已经是不能再推迟的改革。这个改革是一项全社会的工程。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改革。

在《分割与分层》的中文版出版之际,除了以上一些简短的补充之外,我还要向使这本书得以问世的几位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马磊博士。马磊是利用他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宝贵时间,完成这本书的主要翻译和校对工作的。他渊博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中文,尤其是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使得本书的中文本成为可能。其次要感谢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刘欣教授。刘欣教授与我对社会不平等研究有共同的兴趣。我个人不仅受益于刘欣的学术知识,还要感谢他把他的得意门生马磊推荐给我。再次要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静教授。在我为出版中文版感到走投无路之时,她把我推荐给她作为编委会成员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最后特别要感谢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利波女士。在整个出书的过程中,王女士怀着对学术著作的喜爱之情和对工作的热忱,想尽各种方法积极促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她的敬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本书能作为她担任责任编辑的丛书之一出版,实为我的荣幸。

王 丰

2012年10月,北京,清华大学

前 言

花在研究和写作这本书上的时间几乎和这本书(的研究内容)所包含的时间跨度一样长——大概是 15 年。本书的研究思想起源于 1989 年 6 月,当时我在位于夏威夷火奴鲁鲁的东西方人口研究所(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 EWPI)刚完成了一项博士后奖学金项目,我的妻子杨海鸥女士也刚刚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时,我们正准备从太平洋中部这个人间天堂般的美丽岛屿返回中国。

那时,深刻的社会、经济剧变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并逐渐开始扭转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已经解体。中国农民重新回归到了实行集体化之前他们所熟悉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村的非农业活动进入了高潮,一些农民开始移居到城市生活。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之前几年进行的价格改革所导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更是他们几十年来从没有见到过的。

同时,这场改革中存在的漏洞给那些政治精英带来了大量的利益。此类政治腐败的一个结果是,大众逐渐感受到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人们期望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这种局面,但政治改革进展缓慢,被复杂化了。

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有许多参加各种会议和研讨班的中国访问学者,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李学增先生。六四风波之后,我们深入探讨了导致这种大规模运动的潜在社会力量,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为了获得研究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和变化模式的家庭调查数据,李学增在回北京之前,答应帮助我和他的同事建立联系。

1990—1996 年之间，我在东西方中心组织了很多讨论班，与会者是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部分高校的同行。这一系列的研讨班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做了数据上的充分准备，包括数据文档和编码本的建立，并且确定了一些可以进一步合作研究的题目。1995 年夏天，我到辽宁省（本书的研究省份之一）进行了我的第一次较为广泛的田野访问。当我 1996 年进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时，这项研究的初期准备工作大部分都已经完成。

1998 年秋天，在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人口和社会的合作性研究课题后，我全力回到了有关中国城市的不平等研究中。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研究基金的帮助下，我得以在 1999 年夏天（重庆）和 2000 年（四川和广东）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2000 年春天，以访问教授身份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经历，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同行们研究的绝佳机会。

1999 年发生的两件事在决定这项研究计划和这本书的写作方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一件事是我和朋友兼同事王天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进行的田野调查旅行。在重庆市下辖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观察到了城市居民间不平等的上升状况。但令人吃惊的是，从受访者那里经常能听到的话甚至包括一些抱怨，都并非是针对上升的不平等，人们更加关注的反而是平等状况的持续。在田野调查旅途中与王天夫的讨论，以及不同时间在北京大学与杨善华教授和王汉生教授的讨论，使我决定把调查的范围从原来仅仅关注不平等的趋势扩展到对不平等形成的模式进行探讨，这就把持续性的平等也包括了进来。

xv 第二件事是我在北大访学时，王有捐的来访。王有捐参加过 1995 年东西方中心的研讨班，1999 年，他已是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主要分管城市居民调查工作。王有捐友善地鼓励我重新与他所在的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并继续因我 1996 年迁到加州而中止的合作计划。这项继续下去的合作使本研究中的经验性调查数据最终得以扩展到 2000 年。

本书的写作是在三个国家完成的：美国加州的尔湾、中国的北京和香港以及日本的东京。其中大部分的数据分析是在北京和尔湾完成的，大部分的写作得益于三次访问东京应庆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以及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4 月期间以访问教授身份在香港浸会大学度过的学术假（sabbatical quarter）。2001 年 7 月第一次访问应庆义塾大学的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时,我完成了本书其中几章的初稿;2002年2、3月间的第二次访问,本书的全部初稿已基本完成;2006年6、7月间的第三次访问,完成了对全部书稿的修订。这三次访问之所以获得成功,应庆义塾大学特别是邀请我得以成行的津谷典子教授(Noriko Tsuya)居功甚伟。同时,也感谢2006年笔者访问东京时给我提供了文字编辑上帮助的汤若平小姐。在后两次日本之行间隙,我还访问了香港。在香港,我主要是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修订并完成了本书的附录,香港之行要感谢阮丹青教授的盛情邀请。

我的许多同事阅读了本书手稿的早期版本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批评、建议、帮助和鼓励。在他们中间,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蔡泳、陈皆明、Philip Cohen、戴慧思(Deborah Davis)、Matt Huffman、William Lavelly、James Lee、Albert Park、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苏阳、魏昂德(Andrew Walder)、王天夫、怀默霆(Martin Whyte)、周雪光,以上诸位不仅阅读了手稿,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难题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建议和帮助。

虽然本书的错误和不足之责任全部由我承担,但若缺少了上述诸位同事的鼎力襄助,特别是若缺少了周雪光和魏昂德使得本书的论点更加集中和突出的建议的话,很难想象这本书会是什么样子。

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两位同事,苏阳和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给我提供了学术和精神上的支持。许多人帮助我完成田野调查,1995年陪我同去辽宁省沈阳市和抚顺市的陈晓杰,2000年陪我去四川省成都市和自贡市并帮助我安排访问的李东山,2000年帮助我在广东省安排几次访问的任平,我的老朋友、在我四川和广东之行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陈胜利,以及在数据文档的建立和数据的清理方面给我提供帮助的邱立霞、Lingnam Hung、Pearl Li。对以上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本人谨表深深的谢意。

xvi

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也得到了许多组织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北京大学、日本应庆义塾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民主研究中心和亚洲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以及加州大学环太平洋研究计划。

最后,在本书长时间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的妻子海鸥和儿子凌轩给我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是我力量和爱的源泉。对于他们,简单的一句谢谢显然是不够的。

目 录

中译版作者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从平等到不平等	1
从平等到不平等	3
加剧的不平等:理论解释	6
边界和类型:不平等的起源	10
研究背景、数据来源和本书的章节安排	17
第二章 不平等的类型化起源	22
社会主义和类型的创造	23
类型的演变: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时代	26
边界的维持	38
第三章 繁荣和不平等	42
中国的城市家庭	43
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上升	51
增长与不平等	60
住房不平等	70
穷人和富人	74

第四章 扩大的不平等:类型	86
类型化不平等的趋势	87
不平等的模式	97
第五章 平等的维持:边界	123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在城市中的表现	124
小型公有制:工作单位的所有权	134
制衡:新旧工厂制度	148
道德约束:竞争与和谐	150
第六章 多样化的不平等	163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倒U型还是W型?	165
转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蕴含的意义是什么?	168
不平等的多样化:三个社会中不平等的分布状况研究	171
附 录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	179
英文文献	191
中文文献	202
索 引	205

第一章 从平等到不平等

3

20 世纪所有剧烈的社会变革,无一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同遍及众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试验相比。在 20 世纪末全球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前夕*,超过 1/3 的全球人口都生活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Kornai 1992; Lane 1996)。¹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发端于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终结于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和 1991 年苏联的解体,20 世纪见证了这一制度由盛转衰的一个完整循环。²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它对社会经济平等状况做出的承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的兴起,全球出现了普遍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更高程度平等的承诺就显示出其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于二战末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地理边界。冷战不仅为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通过扩张军备来打击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逻辑依据,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积极进行社会改革,以期延长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寿命。资本主义出现以来,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同 20 世纪社会主义试验所做出的承诺相比肩,当然,也很少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像它那样承担了如此之大的社会成本(Ashton et al. 1984; Milanovic 1998; Gerber and Hout 1998; Courtois et al. 1999)。³

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试验中,占全球将近 1/4 人口的中国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无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 世纪下半叶,中国 4 社会同时经历了两种转型,即:当中国努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它也以社会主义试验为基础,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进